



江山语言学丛书 杨锡彭 著

汉语外来词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山语言学丛书 杨锡彭 著

汉语外来词研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外来词研究/杨锡彭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江山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208-07327-2

I. 汉… II. 杨… III. 汉语-外来词-研究 IV. H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3285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曹永庆

封面设计 杨德鸿

·江山语言学丛书·

汉语外来词研究

杨锡彭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36,000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50

ISBN 978-7-208-07327-2/H·26

定价 26.00 元

江山语言学丛书总序

南京,虎踞龙盘之地,自公元3世纪以来,文化日益发展,学术日臻发达。即以近代而论,明代的南京太学,是当时最早创建的最高学府。《洪武正韵》的主编宋濂曾任南京太学的司业,光照汗青的郑成功是南京太学第280年入学的学生。及至清代,著名学者两江总督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三江师范学堂,延至民国时的中央大学,杰出的语言学家黄侃、方光焘、吕叔湘等先后执教于此。近五十多年来,南京大学的语言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国家培养了众多人才,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南京大学语言学科诸同志如今躬逢明时,奋发图强,出版这套丛书,以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古语云:“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一本著作,一套丛书,如果是学术性的,学界同仁会提出要求:

第一,坚实。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朱熹说过:“如人要起屋,须是先筑,教基址坚牢,上面方可架屋。”时下甚嚣尘上的急功近利导致大言欺人、浮辞充斥、硬伤时见,等等,如此岂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会通。学人凡有志者必有追求。追求什么?追求的是超胜。明代大学者徐光启说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就是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

第三,创新。超胜的正道在创新,19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源于创新。”学术,唯有创新方有自家的灵魂。创新之中,最难的,也是最高的,是自主创新,亦即原始原创。

这三点,当为学人悬作标的。自我评估,我们与之距离甚远。但是,有登山的志趣,纵然未必能达峰巅,或可至山腰,但至少是在攀登中;若连登山的愿望也无,那只能老死于山麓。

这套丛书冠名“江山”,“江”者,长江也;“山”者,钟山也。

自序

汉语外来词研究迄已取得显著成绩,但还远远不够,有分量成系统的专著屈指可数。本书不敢自诩,最多只是做了点“添砖加瓦”的工作而已。不过,阅读本书或许可以感到,汉语外来词是很值得深入探索的。

外来词研究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路径。迄今为止,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外来词研究虽然颇有成绩,但无疑还值得深入开拓。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外来词性质、特点的研究,是以语言文字本体的性质、特点为基础对外来词进行学理分析。从学理上看汉语外来词的性质、特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汉语外来词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现象的差异,而不是基本规律、基本特点的差异。古今汉语、汉字的基本性质有很大的一致性,汉语的各种地域变体也有共同的基础和共同的性质。因此,抓住汉语汉字的基本特点,就能举一反三、纲举目张。

外来词对汉语发展、尤其是对晚清以来的汉语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对汉语词汇面貌乃至汉语整体面貌的形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词语结构、词汇面貌发生了哪些变化?现代汉语与近代汉语的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当代汉语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其中,外语对于汉语发展、变异的影响,包括通过汉语中的外来词对于汉语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研究注重共时与历时的结合、普通话与方言的结合、结构分析与功能认知解释的结合、句法语义与语用的结合、汉语研究传统与外来新知的结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思想的结合,等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研究,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汉外语言接触中外语对汉语的影响关注得还很不够。汉外对比研究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以对比为多、为重,对外语尤其是外语通过汉语中的外来词对于汉语语言面貌、结构特点的深刻影响还缺乏全面细致的研究。显而易见,没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就很难真正了解 20 世纪以来汉语发展、变异的动因,往往也就不能对汉语的结构特点、结构性质作出深入而切中肯綮的分析。至于当代社会语言生活中有关外来词的各种问题,更难以给予深入、细致、有说服力的回答。

因此,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外来词研究,既要研究外来词在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各种特点,更要研究外来词通过自身的语义特点、结构形式对汉语的影响。历来对于现代汉语外来词本体的研究,比较注重外来词音、义、形之间的关系,注重外来词对于丰富汉语词汇的作用,注重外来词的汉化和规范化;但是,对于外来词对汉语汉字的影响,尤其是外来词对当代汉语词语意义、词语结构的影响,关注得还很不够。对于外来词本体的研究,也往往站在汉语的立场上,只是考虑怎样“驯化”外来词为汉语所用,而忽略了外来词的语义特点、结构特点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这就给外来词的研究带来了缺憾。从语言事实看,外来词并不是“循规蹈矩”地进入汉语为汉语所用,外来词给汉语带来了外语词语的种种特点,对汉语产生种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忽略外来词的“外来”特点对汉语的种种影响,就无法真正了解外来词,也不一定能真正了解现代汉语的词语结构特点和整个词汇面貌。

就学术视野方面的原因来看,这方面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与忽视意译和意译词有关。意译是用汉语的既有词语与外语词相对应,或用

汉语的既有成分仿译外语词,因此用以对应的汉语词语成分的意义可能会因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意译词并不就是按照汉语词语的结构形式构造起来的,一些意译词其实是用汉语的语词成分按照外语词的结构形式构造起来的,这就给汉语的语词意义和语词结构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基于语言文字本体的汉语外来词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学术视野,既要根据语言文字的本体规律考虑外来词的汉化和规范化,又要考虑外来词对汉语语词意义、语词结构的影响,分析外来词导致的汉语词语结构和内部形式的变异。惟有如此,才能对外来词作出比较全面、深入的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研究。

基于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需要整个学界的共同探索,本书在三个方面作出了努力:

① 力图从本质特征上揭示汉语中各类外来词的性质、特点,总结外来词汉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

② 注重揭示外来词语通过自身的语义特点、结构形式施加于汉语的词语结构和词汇面貌的影响,分析外来词引发的语言变异现象以及当前语言文字应用中有关外来词的种种问题,并且作出理性的、科学的评价。

③ 展示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丰富多彩的外来词现象。

本书的研究,是从语言文字本体的角度对外来词进行专门研究的尝试。尽管力求深入、全面、细致,但在这样大的一个课题面前,个人的绵薄之力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本书倘能引起学界对于外来词研究的关注,激发学界作出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细致的外来词研究,则已达到了写作的基本目的。

谨以余墨,套改先贤严复先生为所译《天演论》所写“例言”中的名言,以示心迹:

一著之成,经年踟蹰。

知我罪我,是存明哲。

前言

外来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

从译借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意兼译词(包括音意双关型、半音译半意译型、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形译词(即一般所讲的借形词)等类别。

从词源角度进行分类,外来词可以分为英语词源的(可可、咖啡、沙发、尼龙、巧克力、迪斯科),法语词源的(芭蕾舞、布尔乔亚、香槟、沙龙),俄语词源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布拉吉、拖拉机、康拜因、杜马),德语词源的(盖世太保、纳粹),日语词源的(经济、社会、干部、组合、右翼、左翼、协会),蒙语词源的(胡同、戈壁、喇嘛、褡裢),藏语词源的(糌粑、氍毹、哈达、金珠玛米),维吾尔语词源的(袷袂、阿訇、亚克西),朝鲜语词源的(金达莱、道拉基、阿妈尼),等等。

从语义上分类,可以分出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工业、农业、军事、教育、艺术、民俗、生活等类别。

以时代来划分,可以分为上古外来词、中古外来词、近代外来词、现

代外来词。

此外,还可以根据外来词分布的领域来分类,根据社会分层进行分类,根据外来词分布的汉语社区进行分类,等等。

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迄今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代表性专著有:

1. 侧重于外来词与文化的关系的专题研究:罗常培(1950/1989)《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语文出版社,1989);史有为(1991)《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史有为(2004)《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辞书出版社,该著为1991年版著作的修订版)。

2. 侧重于领域外来词的专题研究:梁晓虹(1994)《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3. 侧重于外来词词源的专题研究:[意大利]马西尼(1997)《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方龄贵(2001)《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①

4. 综论性著作:高名凯、刘正琰著《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史有为著《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馆,2000)。

代表性词典有:

1. 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

2. 岑麒祥编《汉语外来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0)。

至于外来词研究的专题论文,可谓琳琅满目,洋洋大观,无法一一

^① 方龄贵(2001)虽名为“词典”,实际上是一部外来词考释著作。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下编包括“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补正”和“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据其“词目索引·说明”,共有见于古典戏曲的蒙古语词357条和波斯阿拉伯语词11条。这一统计数均含异体。所收录的外来词,只有“站、搭连(即‘搭链’)、胡同、把势(又作‘把式’)、哈巴(狗)、匾食(或‘扁食’,即‘饺子’)”等少数词语见于现今汉语。

尽举。汉语词汇专著、教材也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外来词。

值得介绍的是 1936 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发行了胡行之编《外来语词典》，这是第一本汉语通用外来词的词典（相对于专科外来语词典而言）。该词典所收“外来语”包括“全译音”、“全译义”、“全输入”（即“形译词”）、“半音半义”“音义兼顾”5 种类型，共 2 762 个词（包括少数异形词），从内容上分为政治、经济、社会学社会运动、文学、哲学、国际、外交、物理、生理生物、心理、论理、伦理、宗教、教育、地理地质学、天文、体育、艺术、法学、数学、医学、军事、科学、普通名词等 24 类，“上自采取最古之输入，如‘葡萄’‘琵琶’‘单于’等词；中及印度佛教的流传，如‘菩萨’‘观世音’‘般若’‘盂兰盆’‘忏悔’等词；下则撷录最近的时语，如‘水鸟外交’‘新注入主义’‘蓝鹰运动’‘国家青年日’等”。该词典的一般体例是列出外语原词与外来词形成对照（佛教词语未能列出外语原词形式）并简略释义，具有简明扼要的特点；但也似有失之简单之处，如未能清楚地区分“全译义”与“全输入”，^①收词则有“过专门者不录”、“又过普通者亦不录”等限定，因此收词不够广泛。该词典虽然影响不大，但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②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1993 年 7 月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在当届会长姚德怀的主持下创办了词汇研究的专刊《词库建设通讯》（2002 年停刊），期间刊发了大量的外来词研究文章，除了对几百个词条进行词源考证以外，还从理论上重点讨论了“外来概念词”（包括音译的和意译的）的性质、范围，建立“汉语外来概念词词库”，有力地推动了汉语外来词的研究。^③

① 例如“景气”注明来自日语，但同样是来自日语的“日和见主义”没有注明词源：“[日和见主义]（社；政）即‘机会主义’或‘骑墙主义’，为看风使舵者的意思。”又如“入超”实际上属于“全输入”，即借自日语的形译词，但该词典仅仅列出了英语词源：“[入超]Excess of import（经）‘输入超过’的简称。一国每年度货物输入额超过输出额，即叫做～。”

② 又，该词典收录的均为一般语词，没有收录一般地名、人名。个别的如“伊凡诺维基”，看似人名，其实是作为“普通名词”收录的：“俄罗斯人称好人儿为～”；“伊费基尼亚”（“希腊神话中的亚茄孟农的女儿”）则归入“文学”一类。

③ 关于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更多情况，参看史有为（2000）。

外来词研究有不同的角度和途径。本书侧重从语言文字本体的角度,讨论汉语外来词的性质和范围;以汉语吸收外来词的借词方式为纲,研究外来词音、义、形(文字记写之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揭示各类外来词的特点,并在学理基础上对外来词应用中的种种问题给予分析和评价;讨论外来词的汉化方式和汉化规律,分析外来词对汉语词汇面貌的影响,尤其关注外来词对汉语词语意义、词语结构的影响。^①

二

外来词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仅刘正琰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收录的日源外来词就达 890 个,其中绝大多数词语都活跃在当今社会交际中),促进了汉语的多音节化,增强了某些词语结构形式的能产性(如在日语的影响下,“名+动”构造出现了语义关系为“受事+动作”的结构形式,增强了“名+动”构造的能产性),增加了音译的新语素,增加了新汉字并促使汉语书面书写的多符号化,增加了新的语音形式,增加了异形同义词、同音词。本书指出:1. 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常把多音节音译词减缩为单音节成分,但有另一种倾向迄今未能引起注意,即同样是为了符合汉语的词形特点或语音汉化的需要,外语词音译到汉语中,增加了音节;而为了表义的需要,在音译成分的前后附加汉语语素(如“酒吧”)的借词方式,也增加了汉语的复音节词。2.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音译可以产生新语素,意译也可以产生新语素。只是意译产生的新语素极少,音译则具有很大的能产性。3. 仿译的词语结构使汉

① 本书不以外来词词源研究为目标,词源的说明只是基于说明外来词音、义、形(字形)关系的需要。对于外来词的词源,本书参考刘正琰、高名凯、麦永乾、史有为(1984)甚多,此外也参考了各家著述和有关词典,书中都已尽可能地注明,尤其是有的例词需要说明其为外来词身份时,或对于比较少见的外来词,都特地注明了所见出处。但因不是以词源研究为目的,所以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一说明所有外来词的所见出处,尤其是具体到某一外来词的“发明”者,更无可能一一确指。谨此说明。

语语法单位发生功能变化。例如受日语词语影响而产生的“受事+动作”的偏正结构,是“名动词”产生的重要动因。4. 使词的内部形式复杂化。在意译外语词语的影响下,一些汉语中本来没有的词语形式出现在汉语中,如“后工业化、后现代主义、城市中国、乡村中国、魅力中国”等。用汉语的实义语素意译外语词的词缀,使汉语词根与词缀的界限不清,因而模糊了汉语复合词与派生词的界限。5. 增加了词语理据的复杂性。用于音译的单字原有的意义往往在音译词词面上形成一层语义外壳,掩盖了音译词的实际意义,音译词的词义理据往往被歪曲或掩盖。6. 增加了汉语词语结构的复杂性。如来自日语的外来词“血吸虫”,是汉语词语结构形式中的异数。“取缔、积极、消极、天敷罗”等词,不能按照汉语的一般结构进行分析,其实属于单纯词。

一般的看法,意译词不属于外来词。这一观点无疑具有很强的依据,但是,值得进一步讨论。本书指出:1. 汉语在意译外来词时,所用的基本材料虽然是汉语的固有材料,却是用汉语中最小的结构单位——语素构造起来的,并不一定搬用汉语中原有的现成词语,意译也可能造成复音节单纯词,因此意译并不一定等于用汉语的材料造词。2. 意译词并不一定就是用汉语的材料按照汉语固有的结构形式创造的新词。一些意译词实际上是用汉语语素作为材料按照外语词的结构构造起来的。3. 通过意译进入汉语的外语成分,有的是真正的新成分,只是由于用汉字书写,掩盖了其外来成分的面目。4. 不联系外语原词的意义,意译的词语往往难有确切的理据。例如英语 game rules 的意译“游戏规则”与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在意义范围上不相等,在汉语原有的“游戏规则”的意义基础上无法确切理解意译 game rules 而形成的“游戏规则”的意义。5. 意译词往往有特定的外语文化的词源,如把“性感”这样的具有特定外语文化色彩的意译词看作汉语的固有成分,就很难有正确的理解和恰当的应用。6. 意译词的理据在外语,不从外来语源的角度往往不能说清楚词语的理据。7. 如果把语音条件作为鉴别外来词的

硬性标准,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即一般所讲的借形词)是不能看成外来词的。但是,包括“连音带义”说的主张者在内的学者都把来自日语的形译词归入外来词。可见,在考虑形译词是否外来词时,显然只是考虑了词源特征。这与“连音带义”说形成了双重标准。其实音译词与外语原词的语音联系只是语音上近似,因为音译词的语音其实是本族语言的语音形式,并不是外语词的实际读音,如果把“连音带义”作为给外来词定性的充要条件,并不能落到实处。如果真正落实“把外语词连音带义搬到本语言里来”,这样的词语只是外语词,而不是外来词。8. 普通话借用方言词,并不是“连音带义”地搬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借形(字形)借义不借音。既然可以把这样的词语称为方源词,把意译的词语归入“外来词”也是顺理成章的。9. 语言符号的价值(value)是“关系”而不是实体。某一语言符号的价值是由把这个符号与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关系所决定的。意译词进入汉语后,不但为汉语增添了具有新“价值”的语言符号,而且也改变了汉语原有词语的“价值”系统。从“价值”上看,把意译词看作外来词不是不可接受的,更重要的是从意译词对于汉语词语结构、词语面貌的影响来看,绝对不能忽视对意译词的研究。

鉴于上述考虑,本书指出:采取开放的态度看待外来词,可以把外来词定义为:在吸收外语词的过程中产生的表达源自外语词的意义的词语;由音译产生的与外语词在语音形式上相似的词语以及译音成分与汉语成分结合而成的词语是狭义的外来词,通过意译或形译的方式产生的词语是广义的外来词。从这一视野观察分析外来词,有助于分析意译对汉语的面貌产生的重要影响,揭示现代汉语词汇特点的由来,揭示现代汉语词语结构、词汇面貌的变异原因。

从汉语中的语素情况来看,绝大多数语素都是单音节的,单音节语素的绝对优势使人们习惯于每个字每个音节都有意义。这是汉语汉字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的基本特点。因此,汉语倾向于采用意译的方式借用外来词。但是字面上有意义的外来词并不一定就是意译

词。如果外来词字面意义并不是词的实际意义,而是各个单字作为译音符号串联在一起时,各个单字本来的意义形成了有理组合,这类外来词就不是意译词。在习惯于字面上有意义的语言心理的支配下,汉语中出现了大量“谐音别解”的音译词。这类“谐音别解”的音译词与音译用字偏好使用形旁表示意义类属的情况一样,显示出汉语倾向于“意化”外来词的特点。汉语中各种类型的外来词,包括意译词、音译词、音意兼译词以及多数形译词,无不具有“意化”的要素和特点。因此与其说汉语倾向于意译,不如说汉语倾向于字面上有意义(意化)。这两种说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意化”不等于“意译”。

在各种类型的外来词中,音译词是最为典型的外来词,因此是本书的研究重点。本书对于音译和音译词的性质、特点的分析,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学理认识:一是汉语汉字的认知图式,这就是赵元任(1979, 79 页)所言,汉语语素单音节现象的压倒优势使人们倾向于把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看作是有意义的,甚至“把没有意义的音节也看成有意义”。这一认知倾向是根深蒂固的,就这一认知倾向而言,古人今人都一样。也正是由于这一认知倾向,决定了汉语音译词词面形式的重要特点。二是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汉字作为译音符号,必然会对音译词的性质、特点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必须作出基于汉字性质、特点的音译词分析。裘锡圭(1985)从汉字作为语言符号的符号和汉字所使用的符号两个层面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基于这一分析看待汉语音译词,其性质、特点的分析就大大深入、细化了。三是从“重新分析”(reanalysis)看音译词音、义、形(字形)关系的变化。这三个方面的学理为音译和音译词的研究构建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基于这三个方面学理认识的分析,构成了本书对于汉语音译词性质、特点进行研究的基本内容。从这一基础出发,音译作为借词手段的价值和音译词对于汉语词汇面貌的影响,以及音译的歧异与阻滞,自然也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对于其他类型的外来词,本书各有侧重地进行了研究,包括:意译

和意译词的性质和范围,意译的价值和意译对汉语的影响,意译的歧异和阻滞;音意兼译(包括音意双关型、半音译半意译型、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的外来词的类型、特点和结构分析;形译和形译词的性质、范围,形译词对汉语的影响;字母词的性质,字母词的价值和字母词的应用,等等。

本书分析了各类外来词对汉语词语意义、词语结构的影响,这方面的内容也形成了本书不同于以往外来词研究的重要特色。

本书对于外来词词例的分析,不以词源的追溯为目的,也不以展示外来词所反映的社会历史、社会文化现象为目的,而是力图展示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丰富多彩的外来词现象。这也是基于语言文字本体意义上的外来词研究所应具有的特点。

当前外来词引进中有三个倾向、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三个倾向是:①意译“快餐化”。②音译“娱乐化”、“个性化”。③语码使用随意化。三个特点是:①汉语外来词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涌现。②外来词歧异形式传播便捷。③电脑书写普及,基于拼音的文字输入增加了外来词同音异形的歧异。因此,必须注重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外来词规范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行政”决策,但是行政决策需要考虑语用和语言文字层面的学理基础。外来词的规范化工作必须建立在学理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理的“导向”作用。学理导向是语言文字应用导向的重要形式。学理导向的基础是外来词的汉化规律和汉化特点。外来词的汉化不等于外来词规范化,但是外来词的汉化是外来词规范化的重要学理基础。学理基础并不一定就能决定外来词的规范标准,但是,没有学理基础,“评价”就没有基础,“抉择”也就难以做到科学、理性。因此,本书把外来词的汉化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包括语音汉化、语义汉化、语法形式汉化和书面词形的汉化。

语音汉化包括音节数量的简化或繁化,以及音素及音节结构的汉语化。音节数量的简化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表现,音节数量繁化同样

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表现。在音素及音节结构的汉化方面,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基本方法有两种:①语音对应法,即根据语音对应规律进行谐音音译。②“汉读法”,即把外文字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的读音读,并转化为汉语的音节形式,尤其是结合外语词的音节切分和汉语译名的音节表达,而不管原文里读什么音,如 Dresden[¹drezdən]译作“德累斯顿”,音素组合 Dre-被分解汉化为“德”和“累”两个音节; Uganda[ju(:)'gænda](乌干达),首音 U[ju:]音译为“乌”。

对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对音规律已有不少研究,但从汉化的角度看,音译中最主要的是要考虑如何用汉语的音节切分外语词的音节结构。从语音对应规律来看,对应的音素在各自与其他音素组合以后,可能变得不对应了。例如英语的[h],一般来说是以汉语中的声母 h 与之对应的,但 Hill(人名)中的[h]要用声母 x 来对应(希尔),因为汉语普通话中没有[hi]这样的音素组合。因此,从汉语音节切分英语词的语音结构来看,最重要的是要考虑音节的对应。

在音节的对应方面,英语中一个音位学意义上的音节可能包含几个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而汉语中音位学意义上的音节与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是基本一致的。在汉语音译外来词的过程中,音节对应主要应指发音语音学意义上的音节对应。因此,本书利用英美姓名音译实例,分析汉语在音译英语时的音节结构处理方法,并通过音译异名原因的分析,揭示了汉语音译外来词的各种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实际上也是外来词语音汉化的方式、方法。

外来词与外语原词的意义(包括附加色彩)相比,往往有一些差异。吸收外来词是为了汉语所用,外来词是为了因应汉语的语用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外来词与外语原词在意义上、附加色彩上的差别也是外来词语义汉化的表现。在语义汉化方面,最常见的是外来词比外语原词语义范围小,往往只具有外语原词多个义项中的一个义项,这是因为外来词是在对某一具体语境中的某个词语进行翻译中产生的,具体语境中